

##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赵 俊

**内容提要**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关键词** 族群政治 非洲大湖地区 殖民统治 “原住民主义” 政治调适

**作者简介** 赵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作为历史地理概念，非洲大湖地区素以独特地形、历史上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和群体分类、各大群体的分化和对立而著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LSYZD21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尤其是自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以来，非洲大湖地区一直是非洲安全热点地区，也是非洲族群政治研究的主要聚焦点之一。族群政治泛指所有与族群相关的政治现象，具体包括：族群关系的政治规范，即处理族群关系所遵循的普遍价值和规范性原则；族性（ethnicity）与权力的关系；族群冲突的解决方式；族群政策的政治逻辑。<sup>①</sup>就此而言，非洲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逐渐成型。1957年的《胡图人宣言》（*Bahutu Manifesto*）和1959~1961年的卢旺达革命（*muyaga*），是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成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sup>②</sup>尽管相关研究把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的起源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甚至追溯到殖民者入侵前，但往往流于史实的罗列和片段式分析，总体上缺乏对于族群政治形成“机制”的理解，也就是说，现有研究侧重于非洲大湖地区历史的断裂处，而对非洲大湖地区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有所忽视。<sup>③</sup>学术界关于殖民者入侵前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体系、群体分类、社会组织存在诸多争议，如关于胡图人（Hutu）、图西人（Tutsi）的起源、殖民者入侵前的胡图人、图西人究竟是不是不同的种族/族群、尼金亚王国（*Nyiginya Kingdom*）<sup>④</sup>究竟是不是“畜牧封建主义”（*Pastoral Feudalism*）国家、契韦齐帝国（*Bacwezi Empire*）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与否，等等。相关历史考证与文化解读也多有不完备或矛盾之处，这也是今天关于非洲大湖地区的历史叙事常常出现概念泛滥、立场偏激现象的重要原因。<sup>⑤</sup>与绝大多数研

① 关凯著：《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Daniel N. Posner,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5, pp. 1-10.

② “*muyaga*”在卢旺达语中意为方向不定、无法预测破坏性的强风。卢旺达人用它形容1959年的动荡局势。1959年卢旺达社会革命实际上也是政治权力从图西人转到胡图人手中的转变过程。See Gé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0, pp. 41-54.

③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trans., Scott Strau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3, p. 15.

④ 关于尼金亚王国，须作简单的说明：今天卢旺达的前身是尼金亚王国，但在1962年卢旺达共和国独立前，尼金亚王国只是今天卢旺达境内最大的王国，当时还有几个小王国或酋邦尚未完全臣服于尼金亚王国。尼金亚王国、卢安达—乌隆迪（*Ruanda - Urundi*）中的卢安达、卢旺达，这3个专名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地理范围并不完全相同的政治实体的称呼。

⑤ See René Lemarchand, “L’Ecole historique franco - burundaise une école pas comme les autre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4, No. 2, 1990; Jean - Pierre Chrétien, “Burundi, le métier d’historien - querelle d’ école?”,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5, No. 3, 1991;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New York: Verso, 1991, p. 40; Eve M. Trout Powell, *A Different Shade of Colonialism: Egypt, Great Britain, and the Mastery of the Sud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16-17.

究一样，本文也将尼金亚王国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这不仅是因为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分化和对立在非洲大湖地区的表现最为典型和明显，以及卢旺达在 1994 年爆发种族大屠杀，而且还因为非洲大湖地区尤其是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至今也受到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分化和对立的影响。探究族群政治形成的根源，无疑有利于我们理解非洲大湖地区国家独立后的族群冲突，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背后族群政治的性质和历史脉络。

## 一 大湖地区传统的群体分类与流动的身份认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非洲大湖地区的主要王国有：布尼奥罗王国（Bunyoro）、布干达王国（Buganda）、安科莱王国（Ankole）、托罗王国（Toro）、尼金亚王国、卡拉圭王国（Karagwe）。关于这些王国的立国年代，史学界充满争议。不管如何，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体系到 19 世纪仍在蓬勃发展，这是一个基本史实。名之为王权体系，是因为这些王国具有君主制的标准属性：有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君主和接连不断的王朝统治；王权体系背后有当地宗教支撑；相对统一的财政、军事、司法制度。除了这些标准属性外，非洲大湖地区王权统治的建立还有一个相对独特的标志物——王鼓。<sup>①</sup> 王鼓在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体系中的地位极高，几乎是国王的化身，也是王国境内各大群体超越各自身份认同，进而形成统一身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族）的象征。显然，王权体系建立在社会等级秩序基础之上，而社会等级秩序的形成又离不开群体分类实践。要了解前殖民地时代的群体分类，非洲大湖地区丰富的口述传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窗口。

### （一）口述传统中的社会群体

在西方人到来前，非洲大湖地区的干达语（Luganda）、基隆迪语（Kirundi）、卢旺达语（Kinyarwanda）等本土语言尚未发展成为书面文字，但

---

<sup>①</sup> 王鼓由专人打造，也是王权的象征。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王鼓犹如中国古代的传国玉玺，不因王位更替而更替。另有一说，国王去世后，其专用鼓会封存起来，新王会另制新鼓。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不适用于尼金亚王国：自鲁甘祖二世恩多里（Ruganzu II Ndori，约 1510 ~ 1543 年在位）之后，卡林加（Karinga）王鼓一直是尼金亚王国的王鼓。非洲大湖地区的王鼓皆有专名，如安科莱王国王鼓巴戈因丹瓦（Bagyendanwa），卡拉圭王国王鼓尼亚巴塔马（Nyabatama），布尼奥罗王国王鼓鲁胡加（Ruhuga）。See M. Fortes and E. E. Evans - 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21 - 162.

是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早已形成一整套王权制度，包括王位继承制度、赋税制度、军团制度等。在文字出现前，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口述传统也是非洲大湖地区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非洲大湖地区有丰富的口述传统，其中以尼金亚王国的口述传统最为丰富，也最为系统化<sup>①</sup>，甚至还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政治制度，即乌布维鲁（Ubwiru）制度。

殖民者入侵前，尼金亚王国有一个特权群体，即维鲁（Bwiru），他们守护着王室秘典，即乌布维鲁。维鲁的权力很大，甚至还有两位维鲁受封为大维鲁王（Umwiru-king）<sup>②</sup>，并配有专属王鼓。一般而言，维鲁出身于特定氏族，但国王也会把有些酋长、有功之臣提拔为维鲁，可谓世袭制和选拔制并行。乌布维鲁既相当于一部法典，又相当于一部王国“官史”（包括立国神话），涉及王国时代政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官史”修撰有制度性保障，而且其本身也是王权体系的一部分。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立国神话是当地口述传统的重要内容，也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群体分类。卢旺达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卡加梅曾说乌布维鲁里面“一个音节也没有变过”，但口述传统的确深受王权政治影响。<sup>③</sup> 史学界在口述传统的史料价值方面存在争议，但大都认为可以从口述传统中提炼出相对确切的文化信息。

尼金亚王国的立国神话大体如下：“基格瓦（Kigwa）从天上降落凡尘，有三子：小胡图（Gahutu）、小图西（Gatutsi）和小特瓦（Gatwa）。为挑选继承人，基格瓦决定考验其子，让每个儿子晚上都看守着一罐牛奶。次日，基格瓦发现：小特瓦喝掉了牛奶，小胡图睡觉时打翻了牛奶，唯有小图西一整夜守护着牛奶。由此，基格瓦认定小图西为继承人，小胡图为奴隶，小特瓦

<sup>①</sup> 这方面主要归功于卢旺达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卡加梅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亚历克西·卡加梅开始搜集、整理卢旺达的口述传统，汇集成册，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本历史著作。See *La Poésie Dynastique au Rwanda*, Bruxelles: ARSOM, 1951; *Le Cod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 Brussels: IRCB, 1952; *Un Abrégé de L' Ethno - Histoire du Rwanda*, Butare: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1972.

<sup>②</sup> 在卢旺达语中，“umwiru”为复数拼写形式，“abwiru/bwiru”为单数拼写形式。尼金亚王国历史上有两大维鲁王：第一个维鲁王，也是第一个维鲁，出身于措贝（Abatsobe）氏族；第二个维鲁王，也是第五个维鲁，出身于科诺（Abakono）氏族。

<sup>③</sup> 杰克·古迪（Jack Goody）承认书面文化和口头文化有不同的记忆方法，但并不接受弗里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 Bartlett）的观点，即不识字的非洲人对于“死记硬背”（rote representation）有特殊能力。See Jack Goody, “Memory in Oral Tradition”, in Patricia Fara and Karalyn Patterson eds., *Mem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4; Jan Vansina, *Antecedents to Modern Rwanda: the Nyiginya Kingd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4, p. 6.

则沦为贱民。”<sup>①</sup>

布隆迪王国的立国神话有上百个版本，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版本大体如下：“坎巴兰塔马（Cambarantama）是亲王贾布韦（Jabwe）和王后恩索罗（Nsoro）的私生子。贾布韦和恩索罗把坎巴兰塔马寄养在布哈（Buha）国王鲁辛达的王宫里，坎巴兰塔马替鲁辛达看护牛群。几个占卜师来到布哈，说出坎巴兰塔马的真正身份。于是，坎巴兰塔马同几个占卜师一道离开布哈国王的王宫。抵达恩科马（Nkoma）山后，坎巴兰塔马献祭了一头公牛，并把公牛皮盖在白蚁丘上，随后公牛皮下传出一些声响，原来是有一条大蛇想要逃跑。这也就是布隆迪王鼓的第一次亮相。此后，坎巴兰塔马改称恩塔雷（Ntare）……一路奔向恩科马山顶，并在途中建造了布隆迪王国的几座都城。”<sup>②</sup>

布干达的立国神话大体如下：“金图（Kintu）从天上降落凡尘，并带来所有文明元素（香蕉、谷物、牛、家禽、铁器、树皮布、新月节等）。金图之妻南比（Nambi）是天国国王古卢（Gulu）之女。南比随金图降落凡尘，但忘记把小米（millet）带下来，于是又返回天上……乌龟是金图夫妇的帮手，而且金图听从了乌龟的计策，打败了大蛇本巴（Bemba）。”<sup>③</sup>

立国神话自然不是史实，却是我们了解殖民者入侵前非洲大湖地区群体分类信息的重要来源，从立国神话中也可以揭示出不同王国在群体分类实践上的差异。第一，尼金亚王国和布干达王国的立国神话把立国者设定为天神，君权神授色彩浓厚，而布隆迪王国的立国神话则把立国者设定为世俗英雄，且其出身为私生子。无独有偶，安科莱王国、托罗王国、布尼奥罗王国的立国者，尤其是布尼奥罗的立国者鲁基迪（Rukidi）也都是从未知领地过来的冒险家，出身于“野蛮人”。<sup>④</sup> 第二，尼金亚王国的立国神话直接涉及群体分类，并把胡图人、图西人、特瓦人（Twa）视为同源同宗，但赋予这3个群体不同的社会地位。此外，安科莱王国、布干达王国、尼金亚王国、布隆迪王国的口述传统都受到契韦齐帝国及其立国神话的影响，这些王国都属于契韦

<sup>①</sup> [法国] 勒内·勒马尔尚著：《卢旺达和布隆迪》，钟槐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8页。本文引用时文字略有改动。原文中的“Gahutu”“Gatutsi”“Gatwa”分别音译为加胡图、加图西、加特瓦。其实，在卢旺达语中，前缀“Ga”是小一辈的意思，相当于英文姓名中的“junior”。

<sup>②</sup>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115.

<sup>③</sup> Benjamin C. Ray,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in Bugand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4 - 103.

<sup>④</sup>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102.

齐文化圈。<sup>①</sup> 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契韦齐帝国是从种族角度理解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形成的重要入口。<sup>②</sup> 根据口述传统，安科莱王国的立国者是瓦马拉（Wamara），当地统治阶层自称是希马（Bahima/Bahuma）牧民，并把当地农民称为伊鲁人（Bairu，带有贬义，相当于农奴）。

包括立国神话在内的口述传统，已经涉及今天非洲大湖地区主要“族群”，但其身份不是一种“存在状态”，而是由“行动”来定义的。<sup>③</sup> 也就是说，非洲大湖地区口述传统虽然涉及社会群体的地位差别和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当地社会群体没有卡斯特体系（Caste System）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当地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

## （二）流动的身份认同

安科莱王国不允许希马人娶伊鲁女人为妻，但可以纳伊鲁女人为妾，所生的后代属于准种姓阶层“姆巴里”（Abambari），一般而言在群体分类上也属于伊鲁人，但也有机会成为希马人。<sup>④</sup> 尼金亚王国图西人口中的胡图人也一样带有贬义，几乎相当于言行粗鄙者的代名词。与安科莱王国的情况有点类似，图西人、胡图人的身份标签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乌布哈克制度（Ubuhake）<sup>⑤</sup>

① 关于契韦齐帝国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史学界有争议。虽然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至少就笔者目力所及）也无法做出最终判断，但我们至少可以暂且认定契韦齐帝国是一个地理覆盖范围比较大的文化圈，并认为这一判断相对可靠，根据有三：第一，诸王国口述传统中的立国者名号及其互相之间的联系，尤其体现在布尼奥罗、托罗、安科莱这三个王国立国者之间的联系；第二，安科莱、托罗、布干达、尼金亚等王国境内一些地名与契韦齐帝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号有重合，如今天卢旺达的小镇尼亚马塔（Nyamata，与契韦齐帝国神话传说中一位国王的女儿同名）等；第三，从基伍湖畔到卡通加河（Katonga）流域的地区，普遍存在库班杜瓦崇拜（Kubandwa/Embandwa Cult）。

② See A. R. Dunbar, *A History of Kitara - Bunyoro*, 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 S. M. Kiwanuka, "The Empire of Bunyoro Kitara: Myth or Reality?",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 No. 1, 1968;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p. 95 - 99.

③ Rita Astuti, "'The Vezo Are Not a Kind of People':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Ethnicity' among a Fishing People of Western Madagascar",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2, No. 3, 1995, p. 466. 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研究的是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Vezo），但这一论断也大体上适用于非洲大湖地区。

④ M. Fortes and E. E. Evans - 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1950, pp. 121 - 124.

⑤ See Alexis Kagame, *Le Cod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 IRCB, Vol. xxvi, fasc. I, Bruxelles, 1952; Alexis Kagame, *Un Abrégé de l'ethno - histoire du Rwanda*, Butare: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1972; Charles Mulinda Kabwete, *Som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in Precolonial Rwanda*, Saarbrücke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GmbH & Co. KG, 2002. 根据卢旺达历史学家夏尔·穆林达·卡布韦泰（Charles Mulinda Kabwete）的归纳，尼金亚王国有四大传统制度：乌布维鲁（Ubwiru）、乌布哈克（Ubuhake）、乌布孔德（Ubukonde）、英加博（Ingabo），分别涉及政治、庇护关系、土地、军事等方面。关于乌布哈克制度的大致内容，See Aimable Twagiliman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wanda*,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2007, p. 162.

下,即便受庇护者是图西人,庇护者也称之为胡图人。当然,这种情况下的胡图人称呼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以形容处境不好的图西人。

与安科莱王国伊鲁人主要通过姻亲关系实现身份转换的情况不同,尼金亚王国胡图人的去胡图化(de-Hutuize)主要源于财富的累积,实现去胡图化的家族就属于去胡图化的人(icyihuture),通过姻亲实现身份转换的现象也存在,但这两种情况下的去胡图化的人会不会转化为图西人,则视不同政治情势而定。<sup>①</sup>类似的现象也出现于布尼奥罗和布干达,甚至有些群体成员的身份标签能够实现跨王国转换。<sup>②</sup>

非洲大湖地区各大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在殖民者入侵前确实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当地“社会”不是由具有明显边界的部落或种族组成的,与之相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流动的、重叠的社会网络,个体具有多个群体成员身份,且群体之间的边界并不固定,而是视情势而定。<sup>③</sup>

具体来说,非洲大湖地区各大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主要源于两大因素:一是非洲大湖地区农耕者与畜牧者的互惠机制或庇护制度,如安科莱王国的奥库托伊沙(Okutoisha)制度、尼金亚王国的乌布哈克制度、布隆迪王国的布阿阿比雷(Buaabire)制度。这3个王国庇护制度的具体实践方式不同:安科莱王国的奥库托伊沙制度、布隆迪王国的布阿阿比雷制度中的庇护者会定期送给受庇护者一头或几头牛;乌布哈克制度(尤其是在殖民统治后期)中的受庇护者只有牛的使用权,却没有牛的所有权,不过,受庇护者因战功而获得的牛除外。安科莱王国的统治阶层曾禁止伊鲁人养牛,尼金亚王国、布隆迪王国的统治阶层也曾禁止胡图人养牛,但这3个王国的统治阶层也确实又常常把牛赏赐、赠予有特别贡献的伊鲁人或胡图人。换言之,殖民者入侵前的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本身的“习俗”或制度已经在限制群体成员资格,但仍有弹性空间,王权政治并没有以群体身份的标准来划界。畜

---

<sup>①</sup> Jean-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190; Gé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 14. 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身份转换,也可参见赵俊:《族群边界、权力介入与制度化——卢旺达族群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政治逻辑》,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3期,第58~78页。

<sup>②</sup> Carole A. Buchanan, “Perceptions of Ethnic Interaction in the East African Interior: The Kitara Complex”,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1, No. 3, 1978, p. 415.

<sup>③</sup> Thomas Spear, “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4, No. 1, 2003, pp. 11-15.

牧者也要为酋长和王室服劳役和兵役，而农耕者则要把一部分农作物收成以贡品的形式上交给王宫或供奉着王鼓的神社，相当于“国库”，贡品除了供统治阶层享用外，也会在农业歉收的年份里分发给臣民以纾困。

二是非洲大湖地区的氏族及其结盟方式。殖民者入侵前，家族、世系、氏族显然是非洲大湖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氏族。这一点在尼金亚王国的表现得最为突出，卢旺达语单词“ubwoke”的词义从原来的氏族扩展到种族和族群，几乎就是卢旺达人群体分类实践史的缩影。<sup>①</sup> 尼金亚王国共有 18 个氏族，包括国王所属的尼金亚氏族（Abaniyiginya），而且这 18 个氏族都包含图西人、胡图人和特瓦人。一般而言，在大多数氏族里，胡图人所占的比例为 85%~90%，但图西人在尼金亚氏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40%。<sup>②</sup> 由此可见，殖民者入侵前的尼金亚王国没有单一由图西人或胡图人构成的氏族。一般而言，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但非洲大湖地区的氏族也呈现出不以血缘为基础、跨地域分布的特点。布隆迪西北部的一个山头有 11 个氏族，而这些氏族在其他偏远地区也有其成员。<sup>③</sup> 乌干达西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一特点源于非洲大湖地区氏族之间的三大结盟方式：一是歃血而盟；二是戏谑而盟（两个氏族彼此嘲笑，以喜剧形式假想彼此有亲缘关系）；三是以禁止捕猎某种动物而结盟。在卢旺达语中，歃血而盟对应于“bunywane”，戏谑而盟对应于“ubuse”，如托罗王国的孔乔（Bakonjo）氏族是尼金亚王国境内西吉（Basigi）氏族的结盟者，也就是说，孔乔氏族、西吉氏族形成一个拱形氏族集团，而孔乔氏族、西吉氏族都演变为拱形氏族集团的分支；在卡拉圭王国，有数个氏族都禁止捕猎某种动物，并由此联合为一个大氏族，且那种动物也因此成为大氏族的图腾。<sup>④</sup>

另外，尼亚姆韦齐人（Nyamwezi）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有点特殊，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非洲大湖地区群体成员身份认同的流动性。19 世纪前，东非沿海人泛称坦噶尼喀内陆专门从事贸易的人为尼亚姆韦齐人，但尼亚姆

<sup>①</sup> C. Niyomugabo, *Kinyarwanda - English Dictionary*, Fountain Publishers, 2009, p. 245; Aimable Twagiliman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wanda*,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2007, p. 162.

<sup>②</sup>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91.

<sup>③</sup> Emile Mworoha, *Histoire du Burundi: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Hatier, 1987, pp. 101 - 102.

<sup>④</sup>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92.

韦齐人的族群身份也是后来在德国人的殖民统治下才逐渐塑造而成的。<sup>①</sup>

直到 20 世纪初，胡图人和图西人也都嵌于氏族之内，并没有典型的部落特征。他们说同一种语言，都信奉传统宗教库班杜瓦（Kubandwa），生活习俗也类似。若从“建构论”的角度冠之为族群，也并非不可。但是，殖民者入侵前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政治，主要围绕中央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角力、扩疆拓土等而展开，各大群体之间也不存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明确的政治规范。除了王族维护血统纯正外，其他群体没有明显的族群政治意识。也就是说，非洲大湖地区群体分类和氏族重构在西方人到来前仍在按照自身的历史轨迹演进，只是随着殖民话语的形成和殖民统治的到来，政治因素在非洲大湖地区氏族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sup>②</sup>

## 二 殖民统治下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化

探险与传教是殖民帝国的前奏，而且探险家和传教士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欧洲成为殖民话语的制造者。所谓“殖民话语”，主要表现为西方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的报告文学、通俗新闻报道、探险日志、旅行游记、回忆录等非小说类作品中那些充满转喻而又缺乏最终结论的判断，由此也直接暴露出殖民主义在非洲认知上的裂痕和矛盾之处。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是第一批进入非洲大湖地区的西方人，而起初殖民官员对非洲当地社会、群体又缺乏了解，因此殖民官员在制定殖民政策时非常看重探险家和传教士尤其是传教士的判断和知识。德国首任驻卢旺达特别代表理查德·坎特（Richard Kandt）、英国驻乌干达保护国特别专员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本身就痴迷于探险和先辈探险家的作品。比利时殖民官员最初在制定殖民统治政策时非常看重在卢安达生活多年的克拉斯主教（Mgr Classe）的意见。殖民官员可谓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殖民话语的首批受众，而且殖民官员随后也成为殖民话语的制造者，并通过具体的殖民政策对非洲大湖地区历史进程和当地群体身份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

---

<sup>①</sup> Alex Thomson,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64–65.

<sup>②</sup> David Newbury, “Clans of Rwanda: An Historical Hypothesi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50, No. 4, 1980, p. 396.

### (一) 殖民话语与族群或种族阶序观念

1858~1859年,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和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前往坦噶尼喀湖地区探险;1860~1863年,约翰·汉宁·斯皮克再次踏上探寻尼罗河源头之旅,并在詹姆斯·A.格兰特(James A. Grant)陪同下前往非洲大湖地区腹地,先后进入卡拉圭王国、布干达王国、布尼奥罗王国,但没有进入尼金亚王国和布隆迪王国。1874~1889年,亨利·莫尔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3次进出非洲大湖地区,主要活动范围在今天的乌干达、刚果(金)、苏丹、南苏丹等国境内。1892年,奥地利探险家奥斯卡·鲍曼(Oscar Bauman)进入布隆迪和卢旺达;<sup>①</sup>1894年,德国皇家第二骑兵团中尉冯·格岑(Von Götzen)先后抵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并于1899年在布隆迪王国都城乌松布拉(Usumbura)<sup>②</sup>设立兵站,就此正式确立了德国在布隆迪和卢旺达的殖民统治,布隆迪和卢旺达被合称为卢安达—乌隆迪(Ruanda-Urundi),沦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sup>③</sup>这些探险家和殖民者对非洲大湖地区当地群体和王权的认知,构成了殖民话语的基本内涵,并对后来的殖民统治政策和非洲大湖地区统治精英、被统治群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上述探险家和殖民者中,斯皮克的影响最大。因此,我们不妨把斯皮克的代表作《尼罗河探源日志》(*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其他探险家、传教士和殖民官员的叙述,以揭示殖民话语的特点。<sup>④</sup>

第一,从话语的定位来看,殖民话语主要有三大“桥段”。一是种族主义。斯皮克在《尼罗河探源日志》的开篇中说,“我们必须记住:欧洲人、亚洲人借助先知与上帝的交流,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也接受神圣的律法,以规范自身的行为,铭记上帝的恩赐;而非洲人却没有,既不知天命,也不晓未

① 19世纪末,尼金亚王国的统治疆域已经覆盖今天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故此称卢旺达。

② 今天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Bujumbura)的旧称。

③ 其实,早在1884~1885年“瓜分非洲”柏林会议上,卢安达—乌隆迪就已经被纳入德属东非(German East Africa),但德国人当时并没有对该地区实现完全控制。除了卢安达—乌隆迪外,德属东非还包括今天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即坦噶尼喀(Tanganica)和今天莫桑比克的北部地区。1924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把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委托统治权授予比利时,至此卢安达—乌隆迪这一称呼才算正式确定下来。

④ 这里借鉴了戴维·斯珀尔(David Spurr)的分析方法。See David Spurr,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2.

来；因此，非洲人只相信运气和魔法，只想在这个世界上自保。”<sup>①</sup> 这段表述其实源于《圣经》故事：含（Ham）受到诅咒，含的后代将沦为其弟兄闪（Shem）和雅弗（Yapheth）后代的奴仆。斯皮克无疑是在重复当时欧洲种族主义谬论：非洲人是含的后代，受到诅咒，注定沦为高等种族的奴仆。斯皮克在《尼罗河探源日志》的多处论述中明显使用了转喻修辞，且一些论断毫无经验根据。二是王族起源。斯皮克告诉卡拉圭国王鲁马尼卡（Rumanika），说鲁马尼卡的长相和希马人有相似之处，鲁马尼卡所属的王族起源于希马人；基塔拉王国起源于盖拉人（Galla）向南方的扩散或扩张，并说“我们不妨这么猜想”。<sup>②</sup> 三是地名改称。斯皮克以及紧随其后前往非洲大湖地区的探险家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和斯坦利，或以英国王室成员，或以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姓名把非洲大湖地区的一些湖泊命名为维多利亚湖、艾伯特湖、爱德华湖、乔治湖、默齐森瀑布等。<sup>③</sup> 转眼之间，“中部非洲湖间地区宛如伦敦郊区”。<sup>④</sup>

第二，“桥段”重复、变化的节奏完全契合于殖民统治的需求。西方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的殖民话语中的所有“桥段”，都在把非洲当地知识或话语转变为欧洲人基于自身历史进程而构建出来的话语体系。<sup>⑤</sup> 殖民话语中不断出现风景审美化与非洲人行为粗俗化的叙事，并让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理查德·伯顿赞赏坦噶尼喀湖风景，斯皮克赞美维多利亚湖风景，但两人又都在持续以鄙夷的措辞贬低当地挑夫和当地其他人秉性，斯皮克甚至把布干达王国王太后喝酒的姿态斥为“猪饮”。<sup>⑥</sup> 殖民话语的制造者在解读“当地风景所展现出来的美、秩序、庄严的时候……也把非洲大湖地区未来接受欧洲

<sup>①</sup> John Hanning Speke, *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63, p. xiii.

<sup>②</sup> Ibid., p. 247.

<sup>③</sup> 当时，布干达人称维多利亚湖为“Nyanza”。在干达语中，Nyanza 也指池塘等水域，并非特指维多利亚湖。非洲当地人分别称艾伯特湖、爱德华湖、乔治湖为鲁维坦齐盖湖（Rwitanzige）、鲁韦鲁湖（Rweru）、马斯约罗湖（Masyoro）。扎伊尔总统蒙博托（Mobutu）、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都曾经用自己的姓名来重新命名艾伯特湖和爱德华湖，但新名都没有延用太长时间。

<sup>④</sup>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204.

<sup>⑤</sup> John H. M. Beattie, “Bunyoro: An African Feudality?”,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5, No. 1, 1964, p. 32.

<sup>⑥</sup> John Hanning Speke, *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p. 316.

人教导后会变得更有序、更美丽的想象投射进去”。<sup>①</sup> 在殖民统治初期，西方传教士、殖民官员沿用探险家的“桥段”，继续美化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族，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为：“希马人（Bahima）长得漂亮，肤色较浅，完全不同于属于劣等种族的胡图农民，他们具有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希马人具有闪族人的血统。”比利时殖民官员雷诺·德布里耶（Renaud de Briey）甚至还推断图西人极有可能是业已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的幸存者。<sup>②</sup>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话语中的“桥段”出现变化，此时恰逢西方殖民统治发生危机之际，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为：“我的一些助手认为，我单单镇压图西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支持、保护卢旺达民众……我自问，是什么促使我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案来处理问题？答案清楚无疑，我想支持卢旺达民众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说，我想撕掉假面具，把本质上体现为压迫和不公正的贵族政治暴露于众。”<sup>③</sup>

由此可见，殖民话语把种族或族群观念带入非洲大湖地区，并给非洲大湖地区的政治注入了种族或族群阶序观念。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种族或族群阶序观念或曰殖民话语发生变化，其原因除了殖民统治出现危机外，也与非洲国家独立运动和全球范围去殖民化浪潮密切相关。乌干达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把殖民话语及深受其影响的殖民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规范（从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说，也就是种族或族群阶序观念）界定为“原住民主义”（Nativism），究其本质，也就是错误的“欧洲中心论”：移住民是现代的，原住民则不是；界定移住民的是历史，而界定原住民的是地理；立法和制裁界定现代政治社会，习惯性服从界定原住民社会。持续进步是移住民文明的标志，而原住民习俗只是自然的组成部分。除了惯常的“分而治之”策略外，西方殖民者至

<sup>①</sup> “风景审美化”源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观点。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探险发现的作品，在修辞上主要使用三大策略：风景审美化（the landscape is estheticized）、意义的稠密（density of meaning）、预设了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控制关系（the relation of mastery predicated between the seer and the seen）。See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00 - 213.

<sup>②</sup> J. B. Piollet,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française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Les Missions d’Afrique, 1902, pp. 376 - 377.

<sup>③</sup> Guy Logiest, *Mission au Rwanda*, Brussels: Didier - Hatier, 1988, p. 135.

少在卢安达—乌隆迪也实施了“界而治之”策略。<sup>①</sup>

## （二）殖民政策与族群政治化

西方各国在非洲大湖地区确立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各不相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刚果地区先是沦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帝国——刚果自由邦，1908年交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成为比属刚果；1890~1914年，坦噶尼喀、莫桑比克北部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属东非；1899~1914年，卢安达—乌隆迪正式沦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1914~1918年，卢安达—乌隆迪沦为比利时军事占领区，1918年后又先后成为比利时治下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1894年，英国宣布布干达为其保护国，并于1896年把保护国的范围拓展至今天乌干达全境。在统治方式上，英国在其非洲殖民地采用“间接统治”方式，法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比利时、德国在其非洲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方式介乎“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之间。<sup>②</sup>

德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先后进入非洲大湖地区，且在确立各自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也充满矛盾和冲突。1910年，德国、比利时和英国最终确定了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政治边界，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之间原本模糊的“边界地区”也就此被清晰的边界线所取代，“边界地区”原本变动不居的群体成员身份也日渐固化，尼金亚王国、布隆迪王国也就此大体上中断了延续数个世纪的扩张政策。<sup>③</sup>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引入了种族或族群观念。在鲁瓦布吉里统治时期（1867~1895年），尼金亚王国的图西人、胡图人的身份标签已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也就是说，“族性”在尼金亚王国的政治中影响更大了。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族群类型渐渐形成并开始固化，当地群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越来越困难，以致极其罕见。<sup>④</sup>图西人渐渐演变为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政治身份，以至于胡图人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就不得不去胡图化。不过，尼金亚王国胡图人的去胡图化现象出现

<sup>①</sup> [乌干达] 马哈茂德·阿姆达尼著：《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田立年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sup>②</sup> 德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历史相对较短，且在德属西南非洲和德属东非所实行的殖民统治政策也有差异，甚至在布隆迪和卢旺达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差异。德国对布隆迪王国的政治干预较多，而对尼金亚王国的政治干预相对更少一些。

<sup>③</sup> 德国把原本属于卢旺达的布丰比拉地区割让给英国的保护国乌干达，把伊吉维岛割让给了比属刚果。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 219.

<sup>④</sup> Catharine Newbury,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Clientship and Ethnicity in Rwanda (1860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2.

于殖民者入侵前，而布隆迪王国胡图人的去胡图化现象则直到殖民地时期才出现。非洲大湖地区的图西人、胡图人、希马人、伊鲁人的身份标签不是殖民者“发明”的，但种族或族群政治化、日益严重的族群对立、分化却与殖民统治脱不了干系。

德国人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实行“间接统治”。1905年，德国驻布隆迪王国特别代表冯·格拉韦特（von Grawert）在自己的述职报告上写道：“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完全承认国王的权力……把国王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一目标在卢旺达或许可以更容易、更早实现……而在布隆迪，我们必须首先恢复国王原来的权力”。<sup>①</sup>到1913年，德国在面积大于今天尼日利亚的德属东非也只配置了70个欧洲行政官员。与行伍出身的冯·格拉韦特不同，德国驻卢旺达特别代表理查德·坎特在德国殖民官员中显得有些另类，<sup>②</sup>却也展现出德国“间接统治”的一致性：“若是主子在，他们（胡图人）持重保守……只要图西人一离开……他们就抱怨说他们没有权利、备受压迫。对此，我也感到无能为力。”<sup>③</sup>

1918年，比利时接管了卢安达—乌隆迪，将之当作比属刚果的第七个省份来管辖，把卢安达—乌隆迪和比属刚果的行政管理权合二为一，但也为卢安达—乌隆迪保留了独立的财政预算权。<sup>④</sup>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利时驻比属刚果副总督、驻卢安达—乌隆迪总督夏尔·瓦赞（Charles Voisin）在卢安达—乌隆迪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卢安达—乌隆迪的权力结构，使得胡图人和图西人这两大族群之间的对立和分化进一步加剧，群体身份原来所具有的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其一，到独立前夕，卢安达—乌隆迪两个王国里的图西人几乎垄断了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其二，强迫当地人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并要求当地人用现金缴纳人头税，导致大量卢旺达人和布隆迪人前往乌干达的棉花种植园；传统封地、乌布哈克制度下的不动产（主要

<sup>①</sup> William Roger Louis, *Ruanda - Urundi: 1884 - 191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 115; Réne Lemarchand, *Rwanda and Burundi*,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0, pp. 90 - 91.

<sup>②</sup> 比起其他德国殖民官员，坎特的身份和职业生涯有点特殊：犹太人、精神病学家、人种学者、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天分的作家。坎特会说卢旺达语，为人低调，生活简朴，出门也不带荷枪实弹的随从，跟卢旺达当地平民和王室有更密切的接触。

<sup>③</sup> Alison Liebhafsky Des Forges, *Defeat Is the Only Bad News: Rwanda under Musinga, 1896 - 193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p. 26.

<sup>④</sup> Michael Crowd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00.

为农耕用地和牧场)越来越私有化,赋税征收对象也从家族、世系转向个体;其三,推行族群身份识别制度,群体成员或族群身份就此彻底被固化,并构成了族群政治的制度化基础。此外,教会和学校教育也推动了非洲大湖地区的种族或族群政治化。在布隆迪,夏尔·瓦赞重新整合大小酋长的领地,以解决行政管理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1929~1945年,布隆迪的胡图人酋长领地占比由原先的20%开始骤减,直至胡图人彻底失去了酋长领地;1931年,布隆迪开始普及人头税;1940~1955年,布隆迪受洗的天主教徒人数从36.5万增至100多万。1925~1926年,比利时殖民当局废除了卢旺达的三头酋长制,随后夏尔·瓦赞总督又在卢旺达加快改革步伐,并于1933年推出族群身份识别制度;1933~1960年,受洗的卢旺达天主教徒数量从10万增至70万。<sup>①</sup>天主教会、教会学校也成为极少数胡图族受教育者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乃至仅有的通道。

综上,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卢安达—乌隆迪,社会—种族秩序似乎只是一种装点,而在比利时人统治下,社会—种族秩序则被推至政治前台。德国承认卢安达—乌隆迪两个国王的权威,并借力于传统领导人来实行“间接统治”。比利时人最初沿袭德国人的殖民政策,不久后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卢安达—布隆迪的政治权力结构。此外,殖民者想把基伍地区打造成像肯尼亚境内那样的“白人高原地区”,再加上在卢安达—乌隆迪以现金形式征收赋税,导致大量卢旺达人(既有图西人,也有胡图人)前往乌干达棉花种植园和基伍地区的白人农场。卢旺达劳工移民内部有分化,而且与乌干达、基伍地区的当地人也形成了某种微妙的以族属为界的关系。

### 三 大湖地区非洲人的政治调适与族群政治的形成

非洲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源起于殖民统治时期,但其结果的产生具有复杂性,其中本土统治精英、被统治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具体表现为本土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群体各自的政治调适。政治调适在本质上是“借力打力”的策略,大体又可以细分为三类策略:“以夷制夷”,如卢旺达统治精英借力于德国人去抵抗比利时人;“以夷治内”,如卢旺达、布隆迪的统治

<sup>①</sup> Jean - Pierre Chré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pp. 268 - 273.

精英借力于德国人征服尚未臣服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治实体、布干达借力于英国当局去压制乌干达保护国境内其他王国；被统治群体周旋于殖民者与统治精英之间，寻求提高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族群政治意识，这一点在卢旺达的表现也比较突出。面对殖民统治，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都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是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布干达国王姆万加（Mwanga）采用外交手段，而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Kabarega）采用军事斗争和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手段。<sup>①</sup>

### （一）统治精英的政治调适

19世纪末至20世纪五十年代末，虽然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政治边界大体已经确定下来，但中央王廷与地方势力的竞争并未就此消解。在鲁瓦布吉里统治时期，白衣神父会（the White Fathers）和德国人进入尼金亚王国。鲁瓦布吉里是尼金亚王国最后一个实行扩张政策的国王。鲁瓦布吉里及其继位者穆辛加（Musinga）都曾借助德国人来控制、吞并处于中央王权统治之外的地方政治实体，并请德国人充当中央王权与地方政治实体、中央王权与天主教会的调解人。<sup>②</sup> 德国和比利时殖民者在殖民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里都接受殖民话语中的“含米特假说”和“原住民主义”，支持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优等种族图西人。瓦赞总督的改革触动了尼金亚王国的王权根基，穆辛加国王与比利时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变得更加激烈。1931年，瓦赞总督废黜了穆辛加国王，并扶植穆辛加之子鲁达希格瓦（Rudahigwa）继位。信奉天主教、生活方式西化的鲁达希格瓦由此成为“白人的国王”，伊曼杜瓦（imandwa）<sup>③</sup> “再也没有机会了”。<sup>④</sup> 英国当局支持布干达王国，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度平和，但乌干达保护国境内4个王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一直十分激烈，

<sup>①</sup> 加纳历史学家 A. 阿杜·博亨（A. Adu Boahen）认为，用“合作分子”（collaborators）和勾结（collaboration 也有中性的合作之义，但也有明显的通敌之义）来指称非洲统治者并不准确，且带有贬义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色彩，应该使用语义更加中性的“合作”（co-operation）或“联盟”（alliance）。See A. Adu Boahen,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II—Africa under Colonial Domination 1880–1935*,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9–10.

<sup>②</sup> See Alison Liebhafsky Des Forges, *Defeat Is the Only Bad News: Rwanda under Musinga, 1896–193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sup>③</sup> 伊曼杜瓦即本土宗教库班杜瓦中的神灵。

<sup>④</sup> Claudine Vidal, “De la Religion subie au modernisme refusé: ‘Theophagie,’ ancêtres clandestins et résistance populaire au Rwanda”,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reliaions*, Vol. 38, 1974.

其中既涉及“失地”问题<sup>①</sup>、乌干达历史叙事中话语权的争夺，也涉及新兴受教育群体与传统领导人的权力争夺。总的来说，乌干达的族群政治受到“含米特假说”的影响并不大，但英国当局的“分而治之”策略是乌干达保护国境内地方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推手之一，也是乌干达族群政治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族群政治中的“界而治之”实为英国当局“分而治之”的结果。

作为殖民统治带来的“副产品”之一，非洲大湖地区受教育群体在人数上相对较少，但毕竟在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殖民统治的后期出现了。布干达的布都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Budo）、卢旺达的阿斯特里达学院（Astrida College）和尼亚基班达神学院（Nyakibanda seminary）、布隆迪的穆盖拉神学院（Mugera seminary），既有出身于统治精英的学生，也有少数属于被统治群体的学生。布都国王学院的学生大都是干达人。1932~1954年，卢旺达阿斯特里达学院里的图西族学生数量是胡图族学生数量的四五倍。<sup>②</sup>随着当地语言发展成为书面文字和教会学校的发展，非洲大湖地区口述传统中的官史与出身于统治精英的受教育者用本土语言的历史书写开始齐头并进。

统治精英中的受教育者接受“含米特假说”，族群政治意识明显强化。殖民话语持有外来文明优越的立场，这也是“含米特假说”得以在统治精英中甚嚣尘上的主要原因。布尼奥罗王国酋长约翰·尼亚卡图拉（John Nyakatura）不再赞同立国神话中的王国开创者起源外部“野蛮人”的说法，转而赞同“契韦齐人是白种人”的说法，并认为这一说法有助于提升布尼奥罗王国的地位，但又有一点修订：“他们（契韦齐人）很可能不是欧洲人，可能是从北方迁徙至基塔拉的阿拉伯人、阿比西尼亚人或埃及人。”<sup>③</sup>20世纪初，乌干达保护国首席部长、新教徒、布干达历史学之父阿波罗·卡古瓦（Apolo Kagwa）整理了布干达的口述传统，并用干达语撰写了《布干达王国列王传》（*The Kings of Buganda*，1901年）。在经学翻译、呼唤干达人民族意识的过程中，

---

<sup>①</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干达人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布尼奥罗王国向英国占领军发动游击战。为了奖励干达人，英国人把布尼奥罗的许多土地划给了布干达王国，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失地”问题。这些失地包括布尼奥罗的王陵、圣林，包括穆本德（Mubende）遗址。因此，“失地”不但是乌干达保护国时期布尼奥罗王国与布干达王国之间矛盾的聚焦点，而且也是布尼奥罗地方民族主义的催化剂，甚至在独立后仍是乌干达族群政治中一根敏感的神经。

<sup>②</sup> René Lemarchand, *Rwanda and Burundi*, p. 138.

<sup>③</sup> John Nyakatura, *Anatomy of an African Kingdom: A History of Bunyoro - Kitara*,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3, pp. 17 - 27.

阿波罗·卡古瓦把政治身份与口述历史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卢旺达图西族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卡加梅出版了系列历史作品,其中包括《卢旺达民族简史》(*Un Abrégé de L'Ethno-Histoire du Rwanda*, 法文版出版于1972年)。卢旺达口述传统把胡图人、图西人、特瓦人视为同宗同源,但亚历克西·卡加梅在《卢旺达民族简史》中却接受“含米特假说”,相关群体起源的叙事宛然“原住民主义”的注脚:“特瓦人是后来被称为卢旺达的地区的第一批居民……胡图人是第二批居民……图西牧民到处寻找牧场,其活动范围也不局限于卢旺达……这些古老的闪米特人在卢旺达留下无与伦比的权力记忆。”<sup>②</sup>

## (二) 被统治群体的政治调适

非洲大湖地区的被统治群体也被裹挟在族群政治化的进程中,尤其体现在卢旺达胡图人族群政治意识的提升。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族群政治化,图西人几乎成为政治权力的垄断者,胡图人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力。普通图西人本身也是被统治群体,其政治地位与胡图人也没有大的区别,但由于长期受到殖民话语的“熏陶”,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确实是优等种族,而胡图人最终也相信了这一说法,并因此痛恨所有图西人,甚至是那些和他们一样贫穷的图西人,因为所有图西人都属于“优等种族”“封建剥削者”。<sup>③</sup>

胡图人也接受“含米特假说”,并把图西人视为野蛮的入侵者,属于外来种族。由于白人神职人员立场的变化、天主教会内部的权力争夺、图西族统治精英对殖民统治秩序的不断挑战,比利时人和天主教会对于卢旺达境内两大族群的态度逆转了,即不再支持图西人,转而开始扶植胡图人。<sup>④</sup> 这也是同样处于比利时人统治下的布隆迪在独立时还保留君主制,而卢旺达在独立前就已经废除君主制的重要原因。

1957年,卢旺达9名胡图族知识分子发表了《卢旺达本土种族问题中的

<sup>①</sup> Adrian Hast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9.

<sup>②</sup> Alexis Kagame, *Un Abrégé de L'Ethno-Histoire du Rwanda*, Butare: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1972, pp. 22-26.

<sup>③</sup> Gé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p. 38-39.

<sup>④</sup> 在热拉尔·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代前往卢旺达的天主教会传教士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甚至出身于劳动阶层,其中瓦隆人(Walloon)越来越多,他们更同情受压迫的胡图人。See Gé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 31.

社会因素分析》(Notes on the Social Aspect of the Racial Native Problem in Rwanda), 又称《胡图人宣言》。他们的立场明显展现出种族或族群政治化的倾向:“问题基本上是由于一个种族即图西人的政治垄断地位而造成的。在目前的环境下,图西人的垄断地位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社会领域……至少就目前而言,为了监察这一种族的垄断地位,我们强烈反对在身份文件中去除‘图西人’‘胡图人’‘特瓦人’的标签,否则就会抹杀现实,妨碍统计律法。”<sup>①</sup> 卢旺达独立后首任总统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就是共同撰写《胡图人宣言》的9名胡图族知识分子之一。卡伊班达早年间在尼亚基班达神学院求学,毕业后先后担任比属刚果友协(Amitiés Belgo - Congolaises)的秘书、天主教期刊《道友》(L'Ami)的总编辑、“特拉菲普罗”(“Travail, fidélité, progrès”,简称“TRAFIPRO”)<sup>②</sup> 咖啡合作社主席、卢旺达天主教会主教佩蒂永(Mgr. Perraudin)的私人秘书,积极参与卢旺达独立前夕的政治运动,组建政党,并在1959~1961年卢旺达革命中迅速崛起为卢旺达新兴胡图族政治领导人之一。1957年6月,卡伊班达组建了卢旺达历史上第一个政党“胡图人社会运动”(Hutu Social Movement, HSM)。同年11月,参与撰写《胡图人宣言》的另一个胡图人约瑟夫·吉泰拉(Joseph Gitera)成立了“群众促进协会”(The Association pour la Promotion of the Masses, APROSOMA)。“胡图人社会运动”“群众促进协会”的党员几乎都是胡图人。吉泰拉也是卢旺达历史上第一个向胡图人喊出“拿起砍刀杀光图西人”的政治领导人。<sup>③</sup> 1959年10月19日,卡伊班达把“胡图人社会运动”改组为“卢旺达民主运动—胡图人解放运动”(th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Movement Rwandais/Parti du Mouvement et de l'Emancipation Hutu, MDR - PARMEHUTU,简称“帕梅胡图党”)。1959年11月至1961年1月,卢旺达爆发革命,政权从图西人手中转移到胡图人手中,卢旺达政治自此后也近乎完全以“种族或族群”来划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斗争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在从图西人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得到天主教会和比利时人的支持,卢旺达的胡图人在独立前后对反殖民主义闭口不提。

<sup>①</sup> F. Nkundabagenzi, *Le Rwanda politique (1958 - 1960)*, CRISP, 1961, pp. 20 - 29.

<sup>②</sup> “特拉菲普罗”,意思是“劳动、忠诚、进步”。

<sup>③</sup> Donat Murego, *La Révolution Rwandaise 1959 - 1962*, Louvain: Institut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1975, p. 897.

其实,《胡图人宣言》里面已经潜含着胡图人秉持的基本立场:接受“含米特假说”,认定图西人是外来种族,以“多数民主统治”“配额民主”为独立后胡图人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胡图人不但反复强调族群分化和图西人在历史上对胡图人的剥削,而且在独立后让政治近乎完全成为胡图人的“保留地”。在1959~1961年的革命和1973年的“净化运动”中,有大量图西人沦为难民,逃往邻国避难,且大多数逃到乌干达和今天刚果(金)东部的基伍地区,加入殖民地时期迫于现金经济和人头税政策而逃离出去的“说卢旺达语的人”的群体中。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后期,又有160多万人(主要是胡图人,也有少量图西人)逃往邻国,多聚集在基伍地区,也带去了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族群对立观念。<sup>①</sup>

总体而言,随着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的到来、殖民话语的形成和殖民统治的确立,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意识开始不断强化。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群体的政治调适是在强势殖民势力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群族政治的根源或始作俑者仍然可追溯至殖民统治者。在本土统治精英那里,“含米特假说”成为维护王权正统的工具;而在被统治群体那里,“含米特假说”则又成为外来种族入侵和压迫的证据。

## 四 结语

西方殖民者到来前,非洲大湖地区政治没有明显的种族化或族群化特征。该地区诸王国的立国神话、口述传统虽然涉及群体分类,但群体成员身份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在殖民话语和殖民统治下,非洲大湖地区诸多群体日渐种族化或族群化,丧失了原有的流动性,族属也在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群体各自的政治调适中固化了,由此体现出族群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西方殖民者制造族群分化,在文化上源于种族主义偏见,也想借助“界而治之”,减少殖民成本,提升行政管理效率,但这一做法无疑为非洲大湖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族群冲突、地区战争埋下了一颗炸弹。

本文探究的是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的起源,但并不否认当地传统制度在历史上已经对群体成员资格产生了排他性的影响。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在

<sup>①</sup> Gérard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p. 374.

文化上有明显的联系，在历史上也有频繁的人口流动，但各王权体系下的社会结构和传统制度确实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便卢旺达和布隆迪素有“孪生国”之称，但两国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在历史上的差异也非常大。由于受到甘瓦（ganwa）集团<sup>①</sup>的冲击，布隆迪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低于卢旺达。这些方面的差异也是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当然，族群政治只是一种客观的政治现象，并不能说族群政治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族群政治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各国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时带来巨大的挑战：1962~1990年，卢旺达政府实行“族群配额”政策，拒不承认那些流亡邻国的图西人有返回卢旺达生活的权利，而且一旦政权出现危机的时候，就会在境内挑起族群冲突；1994年种族大屠杀结束后，有大量胡图族难民和前政权武装部队士兵逃往至基伍地区，随后几个反政府组织还组建了“P5”联盟，反对卢旺达新政权的族群政策（取缔族属）。此外，逃到基伍地区、乌干达的卢旺达人的公民权问题，也常常成为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政治工具。要摆脱殖民话语和殖民统治带来的历史路径依赖，也实非易事。2003年，卢旺达政府正式取缔族属，把国族“卢旺达人”写入宪法，并在2011年推出新版的“卢旺达国史”<sup>②</sup>，可谓卢旺达彻底实现去殖民化的最后一步，但布隆迪仍在实行族群分权政治，独立后的乌干达政府先后又认定了一些新族群，当前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同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分化也密切相关。

尼金亚王国乃至独立后卢旺达的历史进程有其特殊性，但探究非洲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起源，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无疑有助于非洲大湖地区各国维护政治稳定和实现自主发展。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史晓曦）

---

① 布隆迪王国历代国王的后代，也就是王族后裔，他们在布隆迪历史中被分封到远离宫廷的地区，并成为重要的地方政治势力。

② 种族大屠杀后，卢旺达新政权把各政治党派和历史学家组织起来，围绕卢旺达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讨论多年，并最终于2011~2016年以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名义出版了卢旺达新国史的卢旺达语版、法语版和英文版，新国史书名为《卢旺达史：从起源到20世纪末》（*History of Rwand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具体文本可在卢旺达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的官网（<https://www.nurc.gov.rw/index.php?id=70>）下载。